

邯郸市党史資料

(第八集)

内部资料 不得外传

中共邯郸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八月

目 录

张学孔同志回忆大革命前后峰峰、西佐一带

 工农运动及磁县党的建立 (1)

李相虞同志关于几个问题的补充回忆 (22)

纪德贵同志对几个问题的补充回忆 (29)

李峰同志的革命回忆录 (47)

张林全等同志谈抗战前峰峰、

 西佐等农村党组织发展情况 (56)

张太风同志的谈话纪要 (62)

常直同志的革命回忆录 (65)

柳林溪同志的谈话纪要 (71)

朱贵同志回忆对敌斗争片断 (74)

戴荣章同志谈党团组织发展情况 (79)

娄天朝等同志回忆抗战时期义井对敌斗争 (81)

峰峰二矿史编写组关于中和公司工人斗争 (87)

张学孔同志回忆大革命前后的峰峰、 西佐一带工农运动及磁县党的建立

民国初期，磁县在社会生活上、人民教育上，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政治上与人民教育上仍为封建势力统治和掌握。虽然在城镇成立了高小，乡村亦开办了初小，但办教育的都是一些封建文人。初小一般都还供奉孔子，私塾很多，封建儒教还占着统治地位。但有两件事情的出现，对磁县社会的演变发生了严重的后果。一是怡立公司的创办，一是王雅品进入教育界与成立劝业所。

(一) 怡立公司的创办

峰峰和西佐是两个大村，很早以前就有小煤窑，谁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煤窑是两村人民劳动生产的重要副业，更是窑工群众生活收入的主要来源。煤窑又给了两村人民经营生意谋求生活的便利条件。两村农业土地一般又是属于中等、上中等的，这样就使一般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多样性，形成生活上较繁荣的现象。这两村的群众又非常好闹武术，全村有一多半的人都参加了武术班。两村共有七八个武术班。有些人在生产劳动外是常年习练的，在群众中亦流传着武人的故事。如峰峰有“张千斤，苗八百，陈家汉不用说”的故事。“苗八百”实有其人，不知给清朝统治者立过什么功劳，

由磁县至峰峰村一路的村庄，有些地亩粮银，由苗家直接收要。民国成立很多年时还存在。不过因为政府地亩账上没这笔粮银，农民们能和苗家讲价还价百不出一了。峰峰村旧历正月十五，每年唱戏、闹花灯、闹武术，是矿区一带农村元霄、春节仅有的热闹景象。西佐有一苍龙庙，供奉的是隋末人民起义领袖窦建德。窦建德与刘黑闼是隋末农民起义的最大集团首领之一。唐太宗李世民曾亲率大军征讨。窦建德失败后，刘黑闼重整阵容，坚持抗击，一再恢复局势，顽抗到底，英勇牺牲。罗成就是被刘黑闼射死在淤泥河（即今邯郸间的漳河）的。现今邯郸地区就是刘黑闼的主要阵地，永年城就是当时刘的首都。峰峰村西北最高山头苍龙枢山，有窦建德的庙墓，可以打开看看究竟枢内有尸骨没有。窦建德不知何时被民间供奉为龙王，又不知为何被清朝皇帝封为护国苍龙侯。过去每年旧历六月十五庙会时，清朝州官代表皇帝亲临庙堂御祀。清朝灭后始废掉。过去峰峰矿区一带农村，由于环境气候生产技术落后，很少一年两丰收的好年景。不闹旱灾就闹虫灾。三年两头在苍龙庙上跪香祷告，许愿敬驾。敬驾另一个因素是农民终年生产劳动后，强烈要求娱乐的一种表现，所以一许敬驾就万家欢腾。以峰峰西佐两村为轴心的十三村谢神敬驾盛况，真是他处少见的一种田家乐的热闹壮观景象。约二十个武术班及数不清各样文艺花招表现形式，在四五天的表演中，在万千的观众中，竞技赌胜，真象着了魔一样。招来山前山后外来的观众，真是人山人海似的。最老虎的武术班堵住路表演不走，其它武术班露出不满情绪。一见纠纷，各村几十家大小社首就跪地叩头如捣蒜来调解。这种以武术为主的群众性娱乐表演形式，就促进了农民和性格豪强的矿工的斗争精神和反封建。峰峰西佐两村群众，

过去不断发生有吊打旧政权差役的现象，所以在旧社会流传有“山坡窑场没有好孩子”的谬谚。

劳动人民是爱好自己家乡的，从各种不同角度上，从天生的乐观主义精神上来爱好自己的家乡的。西佐峰峰人民虽不断受到旱灾虫灾的自然祸害，但看到别处人民年年遭遇洪水灾害，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就宽慰的说：“还是咱的家乡好。”“要淹了咱的家乡，只有‘老石台’上挂淤渣，那就发水泡天没有世界啦。”自然界又给予了两村人民煤田，使人民有了多方面谋求生活的门路，在比较富裕的生活情况下，又享受到各种各样形式的娱乐表演、元宵春节美好生活的乐趣，西佐峰峰人民就更热爱他的家乡，但突然一个怪物——怡立公司，出现在他们的家园，侵犯这里的地貌煤田，破坏这里的风俗礼节。这样就引起富有反抗性和斗争性的矿区劳动人民对怡立公司的各种斗争来。

关于怡立公司股东的背景可以说是官僚买办阶级的一个雏型。主要股东杨以俭，在开办怡立公司前，就在北京前门里开设有“临记洋行”，在玉泉山有汽水公司，经营洋货，作洋买卖，和帝国主义经常往来。其兄杨以德在李鸿章、袁世凯时代，就办警班，曾任河北警务处长兼保安大队长，管辖全省的保安队；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时，曾任河北省省长，绰号“杨梆子”，是帝国主义在中国警务界一个代理人，最出名的走狗之一。

怡立公司开始时期几个总办是：杨长发，又名杨子荣，基督教徒。是个“看在基督面上”最虐待使女的人；是群众眼中很坏很狡猾的一个人。另一个吴君屏，行伍出身，对群众表面上态度尚好，其实是个软奸家伙。再一个就是李墨卿，原是临记洋行和玉泉山汽

水公司的经理，后来是中和公司的开办人。人民对怡立公司自发斗争，主要是在杨、吴作总办的时期。

人民与公司引起斗争，原因主要是：资本家仗着封建官僚买办势力，用四个轱辘或六个轱辘的平车拉机器锅炉时，不通过土地的主人，就扒平田地或堰头，侵犯农民土地，压坏庄稼，使财产权受到无限伤害。其次是任意在农田中打窑，打不出煤，土地就无代价地受到损失。在打窑地方周围的田地上，踏出很多路来，使土地农产蒙受无限的灾害。这样就引起群众的愤恨、反对和斗争。如不让他们走路，卡住他们锅炉等。还有资本家占了农民的土地，扒了农民的房子，当时规定有地利，按产煤的筐数抽红，但是资本家和地利局人员串通，农民只得到很少的地利抽红。赔偿扒坏的房子钱亦被贪官从中贪污。为此曾打了几次官司也不行。资本家袒护地利局不让查账，还出钱帮助地利局和农民打官司。地利有两种，即正地利，旁地利。正地利按出煤百分数抽红；旁地利按损害得利。

另外与工人的矛盾还表现在：过去刨小窑的时候，工人群众认为天经地义的老习惯，下窑的工人可以带炭回家烧。公司来了以后，禁止工人带烧炭。工人烧炭还得拿钱买。有的工人不执行，常被公司的稽查查出打骂。还有一个矛盾，西佐峰峰教育很不发达，念书的人很少，所以一般劳动人民的小孩，从小就去窑场扫煤拾炭，不但可以自家烧，而且可以卖，这也是生活中一笔不小的收入。自从公司来了以后，就不准小孩进窑场了，借口怕偷煤，因而常把扫煤拾炭的孩子打了，还把筐卡了。还有，农民看不惯公司里的职员的流氓作风或伤风败俗的恶劣行为。所以峰峰西佐每遇唱戏时，发现职员调戏妇女的行为或丑态，农民们就群而攻之。总办杨

子荣的坏舅子就是出了名的被打对象，结果是被打跑了。但公司是压在地方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除了在特别情况下，平时，农民总是受到公司欺压。记得打人最著名最厉害的是一名姓方的总稽查。有一次，峰峰一家小户老实农民胡正老汉，去窑上驮煤，牲口在窑场拉粪，可巧被方总稽查看到，连打带骂，让胡正把粪捧出窑场，还要让胡正吃下去，胡正用手掩住头部防打时，手中的缰绳碰到方稽查身上，这还了得，胡正就被扣压到公司里。胡正的大儿子马庄，二儿子马子，听到父亲受欺被扣，在村中见人就叩头，求老少父老子们救出他父亲，闻下天大祸，有兄弟俩生命和家产承当。村人听到后义愤填膺，便敲钟召人。西佐峰峰两村聚了千八百人，拿着各样武器去包围攻打公司，决心把公司撵走。众人包围公司之前，马庄先到矿上，正好遇到方稽查，就用预备的大粪篓子扣方头上。众人包围了公司，总办等人都躲起来了。方稽查被吓跑，再也没有敢回来。公司受了很大损失，就贿通当时的大名镇守使王怀庆，派了个团长带兵来弹压，要农民赔偿损失。结果，峰峰村的封建地主、上层人物屈服了，以全村名义给公司送一个七八尺长的金字大匾，上刻“德大乃容”四个大字。大字下刻着送匾群众姓名。下款题：峰峰村敬立。挂在公司大门内顶上，赔礼认罪了结。

但是土地房屋是农民的命根子，斗争被镇压下去，地主低头了，而农民却没有服气，一场大的不可避免的斗争潜伏起来了。到一九二七年天门会农民暴动时，把怡立公司烧了个烟飞灰灭，总算报了这个仇。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资本主义在生产上亦有它较封建社会相对的一些进步面。在这以后，公司开采煤产量提高了，矿区进入相当

富裕繁荣局面。杨以俭这时亦当上了参议员。总公司派好几个经理：行政经理王荫普；外交经理李老三（清朝两湖总督李炳衡的后代）；还有生产经理和比利时工程师。他们气势架子更大了。县长来公司，公司总办送行时都不下大厅台阶。这时，西（佐）马（头）铁路也修起来了。生产情况很好。每年冬春两季，附近各县来拉煤的车辆很多。车马来去，卖吃食的叫卖，矿上热闹非常。别的地方一个村子只几家小铺，而峰峰当时有一二百家门面，也养着一些做小生意的人。此时工人的生活也不算坏。大班工人每班挣五毛钱，一月收入十几元钱（当个小学教员每月只挣八元钱）。特别是技术工人生活更优裕，最高的每月工资有三十来元的。处在农村环境下，农产品很便宜，一元钱可以买三十来斤白面，猪羊肉一角多钱一斤，滏河临近一带菜园，各季高贵鲜菜，多是卖给一些技术工人吃的。单从饮食生活角度来看，不但农民，就是一般地主较技术工人生活亦差远了。一般窑工比农民生活亦较好。

经过这次斗争，在王荫普当经理以后，公司对地方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的态度和作风有了显著的转变，采取拉拢收买的手段。

注意和选择能为公司服务的代理人，给以名义和物质上一定的待遇。如给公司交际员二十元津贴的待遇，以拉拢收买。交际员遇事自动站在公司方面出力或通风报信。对个别的代理人也注意提高其身价。如对峰峰劣绅张鼓峰，王荫普送县太爷都不下大厅台阶，却坐上小轿到张家为其母祝寿。所以挖空心思想当交际员的就大有人在。对公司闹纠纷被镇压的人亦进行收买。如收买西佐有地痞性的付永孝、付希宾等。这些人公开或隐蔽为公司通风报信，对公司镇压人民反抗，起了很大作用。只要想一下，就能意识到这种毒辣手

段的特殊意义。

还有一种毒辣手段。他们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农民起来反抗，亦采取小恩小惠进行和解。如果农民不服上诉，他们宁重赂官府，也不让农民得到一点好处。

以李墨卿为首的中和公司，在经营矿业方针上、作风上与怡立公司有显著的差别。他在经营矿业方面是落后的、保守的，缺乏资本家的气魄，带有一般商人气。倾向开采山青煤层，因为顶好，使用顶木少，得利快。在公司打好煤井租出抽租时，不守信义，常常改约，一见出煤产量多好时就加租。有的二八抽租改成倒六四的。即采一百筐，公司抽六十筐。其剥削方法方式是更厉害更残酷。在中和公司搞生产可以说没有大发迹的，对员工提升、增薪是少有的。技术工人、职员的工资也较低。中和公司与怡立公司对比之下，在以上这些方面的差别就较显露。不舍结网，就打不住大鱼。中和公司连资本主义一点进步方面也小气掉了，就更卑鄙恶劣。

怡立、中和二公司从开始创办至第一次国内战争，是其兴旺繁荣时期。建立了大井，修起了铁路，发展了小窑，扩大了工人就业，大大提高产煤量和运输量。安设了电灯电话，兴起了各种商铺和摊贩。矿区形成了一片繁荣富裕的景象。但与公司开办发展繁荣的同时，工人阶级也成长、发展、集中与壮大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过去工人是分散在矿区各处的，现在集中起来了；过去小窑技术落后，完全手工业方式，不能克服煤井下的水患，煤井很小。资本家带来进步技术设备，增加了煤井，扩大了劳动就业阵容。但工人阶级是在一种新形势下发展集中壮大起来的。在封建手工业方式小窑生产时代，劳资阶级界限还不明确和深刻。连人与人之间还

存在着族、亲、友、血缘等关系。现在完全变了，资本家就是资本家，工人就是工人，阶级分明，壁垒森严，天堂地狱一般。工人和资本家交涉，只有大闹天宫——大罢工，才能解决问题。这样就唤起阶级意识、政治觉醒。

（二）教育的兴办与创业所的建立

约在民国四五年间，王雅品当了磁县教育局长，稍后又创办劝业所，对磁县的文化教育和经济发展起了一定作用。王雅品，磁县小屋村人。为人正直，作风生硬，对公共事业积极认真，不畏物议，不顾尘俗，有勇往直前的魄力，真有些革新企业家的精神。士绅给了他一个“王牙狗”的绰号。这个绰号倒真说明王雅品对当时磁县一些封建士绅认为天经地义的规章制度进行过一番冲击。在他当教育局长前，磁县只有两所高小，磁县城一所，彭城镇一所。校长一个拔贡，一个秀才，都是守旧的儒教中人。王雅品掌教之后，没有几年，磁县建立了八九所高小，还有一所女子高小。校长教员大部分都是邢台四师、保定二师毕业的青年人。他整顿了教育方针，充实了教育内容，学校兴起来了。磁县第一高小最多时约一二十个班。王维纲等许多革命人士，都是这时期或以后的学生。邯郸则不同，仅有两处高小。城里高小校长是拔贡，城外高小校长是秀才。两校学生都不多，教员是秀才的更少。学生们还梳着小辫。我到安阳念中学时，校长室门前两边挂着虎头牌，打臂膀的半红黑棍。武安青年一般是上县走关东，小学毕业文凭镶在镜框上挂起来大装门面呢。

其次王雅品创立了劝业所，扶持别人成立了磁县棉业局，提倡种棉，设花房，往济南运棉花，开漳河水渠，成立火磨面粉厂。这

时正是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商业有相当的发展。

王雅品创办劝业所，提倡工商业，对磁县社会经济生产发展方面来说，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在社会生产方面引起两种变化：农村经济由自然经济进一步资本主义化了；但由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生产进一步原料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商品卷土重来，中国轻工业发展走向停顿、衰败和破产。磁县经济亦不例外。失业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磁县培养出来一大批知识分子，但毕业就是失业，当时就发生了一句讽刺俗谚：“毕业生免不了白天不打更。”因此，知识分子职业问题，就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大学生当个区公所书记，虽有些难看亦是难得的事情。许多学生当了兵。当时磁县出现的协力维新会和人生改进社就是尚在求学时期的大中学生成立的，目的为准备毕业后和地方机关闹矛盾挤个位置。俗谚说：“老年爱钞，少年爱俏”。俏就是美，就是理想，就是一个人生观范畴问题。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由于中国有了共产党，在反帝反封建高潮到来的前夜，磁县一些知识分子就参加了共产党。



同怡立公司出现而来的是峰峰矿区农村与资本家的自发斗争；是峰峰矿区新型的工人阶级的出现；这样就给磁县共产党组织的建立造成了政治条件和物质基础。下面就我个人的经历和所知，谈谈磁县共产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峰峰矿区工人、农民在共产党直接或间接的领导下，向怡立公司资本家所作的初期斗争。

“五四”运动时，我正在永年上中学，放暑假时，同学集体回到磁县城，组织了宣传队，分成小组到农村宣传。当时磁县各学校

教职员、学生联合城镇工商市民，亦进行了反日侵略，抵制和焚毁日货的爱国宣传运动。使各界人民得到一次广泛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宣传中也揭露了一些军阀官僚的卖国事实和罪行，提高人民对国事的一般知识，改变了人民不过问国家大事的状态。当时各阶层人民在各种场合谈论国事成了常有的现象。如何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如何才能使国家独立富强，成为谈论的主题。在群众中尤其是农民常常有这样的言论：“我们不信打不了一个小日本，是中国人心不齐，心齐了十个百个打它一个，打死我们一半还有一半打它哩”。别人就提出相反的意见：“你人多没人家机关枪子弹多，腿快没子弹快，到不了人家跟前。”总之，五花八门也谈不出反帝爱国的结论。“五四”运动在磁县唤起了人民对国事的谈论，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和对祖国的爱。由于中国共产党还未成立，亦没机会看到象《新青年》一类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知识界要求进一步开阔政治思想眼界，尚要等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

我在入中学前，在私塾和初小读的都是四书五经。怡立公司在家乡的出现，和人民的自发斗争对我亦发生了很大影响。我是很爱家乡峰峰的。对公司压迫我村村民，很气愤，产生报复的思想。

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我家对怡立、中和两公司股东、经理都有关系。他们对我祖父为人相当尊敬。另一方面，我祖父、父亲都是农民出身，都没读过书，和群众关系很好。我的几个秀才老师都很尊敬我祖父。其中之一李翠峰老师称赞我祖父：“识大题，明大义，刚毅木讷近仁。”

我祖父是同情村民对公司进行斗争的。胡正被扣，村民起来斗争，王怀庆派兵镇压，我祖父挺身而出，为群众作代言人，诉说事

情起因。向公司敬匾，匾上题名第一人即我祖父，是我祖父要求写上的。我祖父送匾带有对公司道义责备的意思。村民和家人对祖父的刚直很清楚，总怕他和公司正面冲突。公司是座大山，个人是绝对无能力反抗的。我很爱我的祖父，总担心祖父出事，这样内心就存在一种压力，引起人生观的思想追求。我不到一年进了四个学校，越级进入中学。爱过达尔文学说，爱过加里波，向往佛陀人人平等都能成佛的说教。可是思想上依然觉得渺茫。这些思想，除佛陀外，其他大体上都是从商务印书馆编的少年模范人物传记丛书中得来的。在中学，只读过商务印书馆出的《东方》杂志和《英语》周刊。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教科书上只有几行的叙述，直至大战结束，天主教神甫到永年代表法国政府答谢中国参战之盛情，学生在脑海里才有了一点儿世界上已打了一次大战印象。当时地方学生眼界和思想境界真可说贫乏到家了。

一九二一年读完中学到北京后，进入书局设的报摊，真象进了“大观园”。我买了新青年、新潮和文艺、哲学书刊等。考入天津法政专门学校后，我在报摊买了许多按斤当废纸卖的《东方》杂志，主要看其中载的欧战和苏俄内战等插图、过去时事以及大事日志。有一次，读哲学杂志《改造》载的一篇文章——“论当代世界三伟人”。三大伟人是：列宁，甘地，威廉第二。文章写道：列宁是劳农政府、世界工人革命领袖。佛陀、耶苏是世界历史中影响最大的人物，但几千年来他们的影响只是一个州或几个州、而列宁的影响几年间就遍及全世界。美国资本大王连黑夜耗子在地板上闹腾亦惊说是布尔什维克作祟了。这篇文章引起我对列宁、苏联、共产主义研究的兴趣。继又买了一本旧《曙光》杂志，其中有高尔基的散文

诗“赞美列宁”，看后很激动。从此就信仰共产主义。（以后我到苏联学习。回国前，到列宁格勒参观，参观程序表中还列有高尔基散文诗“赞美列宁”一项目。）但当时，远不知道中国有共产党。从上海汇款买的约八卷《新青年》杂志中，看到刊有“中国共产党宣言”或“中国共产党纲领”（非卖品），就一连写了三封信索要，始终没回信。一九二二年夏，一天，陈为人（湖北人）走进我屋说：“我是《向导》周报记者。”我们相识了。经过几次谈话，他让我写好入党申请书，约定在天津公园见面。见面时，又来了一个人，就是张昆弟（湖南人）。他们二人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让我负责卖《向导》周刊，以后同志们共同组织过天津青年学生讲演社。讲演人均从北京请来，有李大钊、李石曾、梁启超、梁漱溟等。听众主要是青年学生。

一九二三年底，在天津法专学校开了天津全体党员同志会议，推选出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参加会的有江著源、李锡九、于方丹、于树德、邓颖超、李希逸、张学孔、周有志等三十四人。

一九二四年一二月间，党指定组织了河北省临时省党部，成员有江著源、李锡九、于方丹、李希逸、张学孔五人。天津市委有邓颖超，其他人忘记了。当时党部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国民党员不出来干。当时工作主要是建党发展组织，进行宣传，领导反帝爱国运动，及建立地方党组织。一九二四年夏，张兆丰加入共产党后，磁县有三个共产党员：张学孔、周有志、张兆丰。我们回磁县，在彭城镇宣讲所搞过宣传，在县城内进行过一次以学生为主的座谈会。

一九二五年怡立公司开始动工修筑从峰峰到纸坊的铁路（未完成）。事前没有和土地所有权主人商量，他们自己就决定了地价，

破土筑起路基。当时正是谷子秀穗季节，农民受到很大损失，引起群众的愤恨。我回到峰峰时，各村群众正在酝酿和公司斗争。那时搞群众斗争是困难的。受侵害地户包括各阶层，而领导权大都被各村的上层人物掌握，特别是街儿庄有些知识分子，想借着群众的力量，采取两面手法，在和公司交涉中，取得作个公司交际员。所以，他们不同意打官司，也不同意群众打闹。峰峰群众都主张作合法斗争。我考虑后，就商定了一些代表，我们一起到磁县去控告。但此时杨以德正当河北省省长，磁县政府不敢接状子。后来通过奉军某营长关系，才把状子递进去，但县政府拖着不办。我就到天津和党组织商谈这个问题。此时河北省督军是奉军李景林（河北枣强人），他和杨以德有矛盾。我们想利用这个矛盾大整怡立公司一下。我找到本校一个枣强籍的教员商谈。他让我搞一份怡立公司违法的材料。我给峰峰写信，叫搞某些问题材料。可是在我去天津时，怡立公司觉着再不向群众让步要倒霉；而李景林虽然想搞掉杨以德，但又怕我们利用冯玉祥搞他，他便采取折衷手法，让磁县县议会出面调停，议定每亩地比先前给的价钱多三元。怡立公司同意了，别村的农民也都同意了，并领了钱。惟有峰峰农民等我回来，没有领钱。我回去以后，县参议长张照明到我家找我，商谈此事。我和农民们碰头商议，大家认为：这场斗争主要是争口气，不在乎几个钱，既然怡立公司让步了，地价又长了三元，我们也就算了吧，这场斗争到此为止。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主要搞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张昆弟、陈为人就在京汉铁路线上搞铁路职工运动。当时还不能直接成立工会，是采取工人俱乐部形式争取建立工人合法组织。如邓中夏在长辛店进行工人运动就采取这种方式。一九二二年，在共产党员领导

下，怡立公司机器工人，曾要求成立工人俱乐部。当我冬天回到峰峰时，斗争已结束。大体情况是：最初工人集会，向公司交涉要房子、设备，准备成立俱乐部。公司说研究研究，采取拖延态度，想拖掉这事。经多次交涉，资本家态度竟强硬起来，不允许成立俱乐部，更不给房子。工人们的态度也很强硬，原因是和京汉线工人运动取得了联系并得到支持，感到阶级的力量。以后工人强占房子，弄些乐器家伙等，并组织了纠察队和公司对抗，斗争非常激烈。最后公司开除了一些工人，有些工人便自动不干走了，来了个大罢工。工人临走之前，把矿上一些主要机器破坏了。铁路、机车也都破坏了，使公司损失了大约十几万元之多。资本家后来从美国买新机车，还请来一个美国工程师。换了车厢，铁路也改宽了，生产才慢慢恢复。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对一般工人，尤其是附近一带的农民有极深的影响。资本家也受到了沉重打击。斗争失败的原因是工人们对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和本阶级的力量还认识不够。另外方式猛烈，不留回转余地。而且全部领导人退出阵地一走了之，把破坏机器作为主要斗争手段，也是失败的因素之一。最主要的是这次斗争参加的只有机械工人，没有人数众多的窑下工人，因而力量小，不能取得彻底胜利。

三

天门会出现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间，发源地在林县油村沟，首领韩玉明。引起和旧政权斗争的起因，据说是河南、山西省界上的税卡，对山村来往农民非法勒索很厉害，实在不能忍受。一次激起油村沟群众的愤怒，将税卡人员打死。林县派民团到油村抓

人，被油村沟的群众把枪给缴了，民团吓跑了。在这以前，油村沟的群众在韩玉明的领导下，已经组织起天门会。此时见事情越闹越大，为了自卫便加强了天门会的组织，派人站岗放哨。接着林县民团又去了，又被打跑，并又缴了一部分枪支。天门会便在油村沟一带山村继续扩大组织。以后林县和安阳两县民团联合去打油村沟，也被韩玉明领导天门会群众击溃。从此天门会的声势就更大了，各村联合设岗放哨，建立了根据地。当时正是直系吴佩孚复起和奉军联合对冯玉祥等国民军进行战争和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奉直军阀无力过问，这样天门会就发展壮大了起来。天门会最盛时期的主要地区有林县、涉县、磁县、武安、安阳等县。前四县会员主要为农民，安阳会员占显赫地位的是投机土匪性的封建局子。

此时，奉军在磁阳漳河一带农村驻防，这些军队都住在农民家里，到农民灶上做饭和妇女混搅在一起，每家都提心吊胆。并有些奉军作风极坏，污辱妇女，引起群众的愤怒和图谋自卫。听说林县天门会很有办法，漳河边农民首先派人到林县领会，这样天门会就在磁县发展起来了。会内设坛，分有文武传师，文传师宣传会议，武传师领导唱咒表练武。最初出名的是岳城传师李有录，他带领群众包围了住在岳城关帝庙一连奉军，并将这一连人全部杀死。天门会的气势就更盛了，缴了民团枪支，占了村公所、管理起农民事务来了。

峰峰村到油村沟在会领坛的起因是：当时煤矿正繁荣的时期，峰峰村一杂货铺主张书堂，春节和平日在铺子里设赌，每晚可抽头十五六元，竟因此在铺屋筑起三间楼房作赌场。当时怡立公司煤矿矿警队长薛梦麟（抗战时是磁县国民党一支队司令），在峰峰张书堂铺子隔壁开设个饭馆，看见张书堂如此发财，有些眼馋，也设起